

在互联网环境中重寻“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

张磊 胡正荣

(中国传媒大学 广播电视研究中心 北京 100024)

摘要: 全球权力转移和其他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为信息传播领域带来新动力,而互联网则成为全球竞争的新场域。20世纪70-90年代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有得有失,如今仍有其积极意义,启示了在互联网平台上类似运动开展的可能性。当前由美国主导的互联网信息秩序仍然是不平等和不均衡的,一种新秩序亟待建设。在建设过程中,可能从之前运动中获得启迪,而新的形势和条件要求重寻理念、重塑主体、重建制度,在多元化格局中寻找秩序建立的思路与途径。

关键词: 互联网; 国际传播; 全球权力转移;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

中图分类号: G20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338(2014)05-0102-05 DOI: 10.3969/j.issn.1674-2338.2014.05.013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与传播格局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随着中国等金砖国家的兴起,美国一家独霸的局面受到冲击,全球出现了“权力转移”的态势。^[1]经济全球化虽然颇受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经济命脉日益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繁荣驱动力还是金融危机都呈现出明显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文化交流更趋频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了解固然增多,冲突也显得更加激烈。

在信息传播领域,变化则显得步伐稍缓。一个基本的判断是,美国及西方主要国家仍然占据全球信息流动的制高点,世界信息传播格局仍然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国际新闻的主要信息来源仍然是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西方三大通讯社。好莱坞电影席卷全球,传递着美国式的价值观,也重塑着各个民族国家的本土文化面貌。互

联网成为信息流通最广阔的新平台,然而无论是政治经济体系,还是语言文化要素,美国及西方仍然控制着主流。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信息与传播应该如何寻找和再造一种新的秩序,以适应国际秩序变化的总体态势,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总体福祉?本文重新检视了20世纪70年代肇始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并在互联网环境下思考类似运动的可能性,从行动主体、体制和理念三个方面作出探索。

一、重新检视“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

20世纪70年代,有鉴于世界新闻与信息流动的不平等和不均衡状况,“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被提出来,并迅速成为全球传播改革的核心运动。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包括第二世

收稿日期: 2014-07-05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12&ZD0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的中国国际传播力建设研究”(12JJD86000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磊(1977-),男,山东莱芜人,传播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化研究等;胡正荣(1966-),男,宁夏银川人,新闻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教授,主要从事国际传播理论等研究。

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包括西方的批判学者,也包括来自各个领域和层次的媒介与非政府组织,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它的主要领导者。1970年,联合国第16届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建立NWICO的议题。1976年,在突尼斯举行的一次不结盟国家研讨会上,正式宣称要建立一种新闻、信息和传播的“世界新秩序”。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届大会发布了《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又称为麦克布莱德报告),成为NWICO的纲领性文献。其中明确指出“个别传播大国对世界信息流通系统的支配是推行文化扩张主义的过程,而发展中国家的牵制和反抗是抵制文化侵略的过程。”它提炼了82条建议,包括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自主传播能力、强化文化认同感、增强内容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推动国际合作以及国际传播机制的建立等等,以达成建立一个新的全球传播秩序的目标。[2]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22届大会还制订了1985-1989年建立NWICO的中期计划。

可惜的是,这次运动更多存在于政策和理论辩论的层面,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美国的激烈反应和对抗是运动失败的直接原因。1981年和1983年,美国先后两次在法国的特鲁埃尔组织部分国家和部分新闻组织参与的国际会议,反对NWICO的原则和主张。其主要理由就是NWICO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它的践行会损害“信息自由流动”,违背了“新闻自由”的基本人权。1983年12月28日,美国时任国务卿舒尔茨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正式通知美国将于1984年12月31日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停止支付应承担的经费。[3]

此后,NWICO虽然仍继续得到讨论与呼吁,但基于美国的反对,这场运动并未取得预期中的成果,以至于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走向衰落。运动的亲历者之一、芬兰教授卡拉·诺顿斯登多次撰文记录和反思这场运动的得与失,他认为,运动背后的“政治势力”成为影响辩论走向的重要因素,正是20世纪70年代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及其对第一世界的声讨使得它令人瞩目,而正是90年代两个世界国家的联盟断裂使得它走向衰落。[4]本文基本上同意诺顿斯登的观点,即国际政治的力量对比和演变构成了NWICO的幕后角逐,也成为它起落的关键。

20世纪80年代,正是美国的福特主义、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年代。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则在80年代末遭遇挫折。政治经济脉络左右了全球文化传播的根本走向,这是NWICO未能成为现实的根本原因。但是,它的理念、原则和思想遗产却极其宝贵。

如果说在20世纪通讯社是国际新闻和信息流动的核心主体,那么进入21世纪之后,互联网则成为全球信息传播争竞的最广阔平台。人们或许为这个“跨越疆界、充满自由”的信息平台赋予了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它的政治经济结构却不断提醒我们,这仍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构。

史安斌指出,即便是号称“无国界”的互联网,90%的信息是用英语传递,80%以上的网站来自欧美,新闻传播领域的“欧美霸权”始终无法被打破。[5]伍刚对中美两国的互联网国际传播能力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虽然已是互联网大国,但并非互联网强国,其核心技术和软硬件基础设施对美国的依赖极为严重,原始创新能力远远不足。[6]美国学者丹·席勒更提醒说,我们习以为常的互联网,实际上是在美国诞生的一个特定的传播平台“因特网”:“无论是诞生之日,还是当今之世,因特网都不是纯粹市场行为的化身。实际上,它其实是由美利坚合众国这个特定的国家来孕育的。”他进一步指出,关键性资源包括IP地址、顶级域名,以及技术标准的制订都掌握在美国政府机构及其合作者的手中,它被置于一种美国式“单边主义”的政策之下。[7]

因此,那种以为互联网是一个“超越国家”的传播体系的认识未免过于幼稚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如肯尼亚、印度、埃及、墨西哥等)都在努力争取“互联网主权”,即允许更多国家和机构参与到互联网核心原则的设定与关键资源的分配过程中。毫无疑问,美国反对这种主张,就像它曾经反对NWICO一样。美国的理由也是类似的:要保护互联网的信息自由,防止受到一些民族国家(尤其是一些“独裁者”)的控制。这些争议延伸到了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当中,如国际电信联盟(ITU)在2012年举办的“国际电信世界峰会”(WCIT)。丹·席勒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述与评论,指出了这场斗争与NWICO运动的相似之处。

总之,互联网并非净土一块。它承继了全球

信息传播不平等的发展态势,也引发了新一轮的全球斗争。换言之,NWICO运动正以某种形式在互联网环境中重新展开。那么,一方面借鉴NWICO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思考互联网环境的特殊性,我们是否可以寻找到一条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新路径?

二、寻找互联网时代的新秩序

互联网时代的新的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首先必须从NWICO运动中汲取养料,其核心就是对旧有秩序提出挑战,寻求可能的创新格局和路径。其次,它也必须从NWICO运动中吸取教训,不能仅仅依靠国际政治斗争的势力格局来决定新的传播秩序。最后,它还必须理解互联网时代的一系列变革,从而制订新的原则、策略和路线图。

国际政治学者章前明指出,任何一种国际秩序都是国际力量分配、国际制度和主导价值观念三大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8〕在这种作用下,国际秩序(包括狭义的国际政治秩序和广义的世界秩序)既是主权国家的合作产物,又是超越了主权国家的一种状态。政治学家郑永年总结说,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无政府状态,不存在一个高于主权国家的“世界政府”,他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双边关系可能会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9〕然而,足以带来格局变化的新兴力量不仅仅是中国或其他新兴民族国家,还有更多层次的国际力量的分配重新展开,而新的国际制度和价值观念也都在形成过程之中。作为国际秩序中的重要一环,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新秩序也受到相应的影响。

(一) 重塑主体: 国际力量分配

国际新秩序的主体性力量,绝非只是民族国家政府这单一层次。正如赵月枝所言“民族国家已经不足以作为理解和分析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传播现象的唯一维度了。”〔10〕(P. 129)

哈特和奈格里在其《帝国》一书中提出了新的概念“我们基本的假设是主权已经拥有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一的单一逻辑下整合。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他们进一步分析了全球权力格局的“金字塔”,指出美国、世界七大工业国和一系列超国家联合体(如世贸组

织、世界银行等)构成了第一层级,大型跨国公司和区域性影响力较强的一些主权民族国家构成了第二层级,而大多数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的普通民众则位于底层。〔11〕

赵月枝沿着这一思路,描绘了世界传播舞台中的四个主要参与者:超国家机构、民族国家、资本和非政府组织的角色与力量构成。她认为,一方面国家和资本的携手使得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甚嚣尘上,这构成了“帝国传播体系”;另一方面部分民众力量也在通过各种组织及实践来进行抗争,形成了一种“双向运动”(波兰尼语)。〔10〕(PP. 133-143)

互联网的国际力量也不仅仅涉及民族国家。由于美国力图将核心资源掌握在其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因此超国家机构对此难以染指,如前述国际电信联盟曾多次在会议中讨论将互联网纳入其管辖权,却总是无疾而终。反倒是基于民族国家的资本的力量在其中拥有大量的权力。根据ALEXA网站的流量排名,全球前十网站分别是Google、Facebook、Youtube、Yahoo、百度、Wikipedia、QQ、淘宝、Twitter和Amazon,其中七个是美国公司,三个来自中国。根据股票市场的市值,排名前十的分别是苹果、Google、阿里巴巴、Facebook、Amazon、腾讯、eBay、Priceline、百度和Yahoo,全部来自中美两国。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个体力量虽弱小但体量庞大的非政府组织、草根媒体、社交网站和广大全球用户,它们是被剥削的对象,还是民主力量的源泉?

若是重构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新秩序,单单依靠民族国家政府之间的博弈和谈判只能落入传统政治的窠臼。实际上,互联网信息权力的争夺从来就不限于政府与政府之间。

中国向来强调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落实到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方面,超国家组织同样受到重视。然而正如赵月枝所批评的,反倒是那些“大部分下层民众和边缘人群”,容易被遗漏于国家视野之外。〔12〕天安门所悬挂的标语之一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全世界”与“人民”,或许正是互联网新秩序最值得依靠的力量。

(二) 重建制度: 全球协商体制的建立

制度的核心是规则。姜飞指出,新媒体的兴起使得传统传媒的管理体制以及整体的现代工

业组织形式都面临挑战。[13]当前互联网核心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所谓“信息自由流动”与“信息主权”的对立。美国政府、大型互联网公司和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不仅继承了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传统,而且更高地实现了这一原则,因此绝不可能放弃,必须打破一些可能的壁垒。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则认为,主权至高无上,信息主权同样是主权的构成,为了维护本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采取适当的屏蔽、管制、治理措施完全是正当的。如果说前者代表了既得利益团体的愿望,那么后者则代表了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的诉求。

实际上,信息的自由流动与自由市场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它秉承这样一种逻辑:只有在壁垒最少的开放性竞争中,人人才能获得最大的权益满足。这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变种,也是一种所谓的“丛林法则”。竞争并非完全不可取,但如果竞争的结果是零和博弈,那最终能否实现人类福祉,是颇值得怀疑的。

因此,一种替代性的体制就是“多赢”(all-win)。2011年6月1日,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题为《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他强调“在相互依存的当代世界,人类共同体的确需要一种更加文明的信息传播规则和秩序。”他提出应按照FAIR观念来重构世界传媒新秩序:公平(fairness)、多赢(all-win)、包容(inclusion)、责任(responsibility),或可考虑建立一种媒体交流与协商的机制,称之为“媒体联合国”。[14]

这样一种机制的确立必须在某种超国家的机构领导之下才能完成。它有赖于双边以及多边协商,但更可靠的是依托现有的机构(如国际电信联盟)或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机构来组织整体的协商。当然,更重要的是将关键资源的分配权力和技术规范的制订权力从美国及其控制下的商业及民营机构手中释放出来,这听上去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它只能建立在长期斗争所形成的共识基础之上。

(三) 重寻理念:文化价值的多元化

为了达成互联网国际新秩序的制度建设,必须重寻一种有异于现行规则的理念。换言之,进行文化价值的重新建构,达成国际共识之后,方有可能设立互联网新秩序的建设路线图和时间表。

在理念方面,美国与中国的差异表现得极为明显。对美国来说,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是普适性的,丝毫不容动摇。而对于中国来说,首当其冲的是民族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2014年适逢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发表60周年,这种外交和国际政治理念强调的是对多元文化价值的尊重和保护。

这种理念已经广获认同。2005年7月1日,中国和俄罗斯联合发布《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提出了12点建议,其中包括“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应成为相互充实而不是相互冲突的基础。……应尊重和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在金砖五国的峰会宣言中也多次强调,应互相尊重、开展多边外交、尊重联合国的作用。这都体现了对多元价值的维护。

互联网作为新的传播平台和交往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反映了多元价值体系确立的可能性。互联网上“众声喧哗”,无论是Facebook、Twitter还是新浪微博、腾讯微信,都在不断传递着多元的声音。智能移动互联、云计算和云存储、大数据挖掘等新技术与应用开创了一个多彩的明天,互联网看似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地域界限,但它重新将地理位置上生长着的本土文化发扬光大。曼纽尔·卡斯特尔指出了互联网塑造的“真实虚拟文化”(culture of real virtuality),其核心就是流动空间和本土空间的辩证统一。[15]虽然流动空间带来了全球精英的意识形态整合效果,但本土空间来源于人们的全部社会经验,它并非那么轻易地被捕获与整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全球社交网络中的地方性知识与地方性文化不断从缝隙中找到成长的机会,而这正带来了全球民主的真正可能性。赵月枝与汉凯特总结了全球媒体民主化的四波浪潮,其中第四波正是发生在互联网时代。他们指出“互联网促进了致力于社会民主化和传播民主化的跨国民间社会网络的形成。”[16]在整合了包括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的各种力量,在跨越了阶级、种族、性别的界限之后,互联网有可能将社会民主化的成果推上前台。

三、结 语

互联网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社会进程,尤其是在当前纷繁芜杂的国际格局

中种种动力因素的综合作用不断造成各种正向和负向的效果,影响着互联网的未来,也影响着全球信息与传播的新格局。

如前所述,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它勇敢挑战既存的不平等、不均衡的国际信息秩序,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和一系列国家及机构的努力,对传播的价值和理念展开了广泛的辩论。虽然最终并未真正形成新的秩序,但它的斗争性和理念成果弥足珍贵。

互联网成为全球信息流动的新场域之后,不仅对国际新秩序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为新的运动带来了丰沛的机遇。然而,如今对于新秩序的追寻不能完全复制数十年前NWICO的模式。新的秩序必须考虑主体和价值的多元性,一方面依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另一方面要超越民族国家,整合超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草根民间社会的力量,重寻理念、重塑主体、重建制度,才能寻找互联网环境中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 [1] 赵月枝. 专题研究·“传播与全球权力转移”[J]. 现代传播, 2013 (6): 58.
[2] 肖恩·麦克布赖德. 等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1.

- [3] 林珊. 对抗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不得人心[J]. 国际新闻界, 1985 (4): 1-6.
[4] 卡拉·诺顿斯登.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教训[J]. 徐培喜译. 现代传播, 2013 (6): 64-68.
[5] 史安斌. 中国对外传播的挑战与前景[J]. 当代世界, 2011 (8): 16-18.
[6] 伍刚. 中美互联网国际传播力对比研究[J]. 中国广播, 2012 (3): 55-58.
[7] 丹·席勒. 资本与国家: 因特网的政治经济学[J]. 张磊译. 现代传播, 2013 (6): 59-63.
[8] 章前明. 从国际合法性视角看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1): 5-17.
[9] 郑永年. 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未来[J]. 国际政治研究, 2014 (1): 36-48.
[10] 赵月枝. 传播与社会: 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1.
[11] 迈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M]. 杨建国, 范一亭译.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08.
[12] 赵月枝. 国家形象塑造与中国的软实力追求[J]. 文化纵横, 2013 (6): 52-59.
[13] 姜飞. 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的中国方向[J]. 中国记者, 2011 (7): 18-20.
[14] Li Congjun. Toward A New World Media Orde [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1-06-01.
[15] 曼纽尔·卡斯特尔.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16] 赵月枝, 罗伯特·A. 汉凯特. 媒体全球化与民主化: 悖论、矛盾与问题[J]. 朱怡岚, 靳泽清译.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03 卷, 1-18.

Revisiting NWICO in the New Environment of Internet

ZHANG Lei, HU Zheng-rong

(National Center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Global power shifts have brought changes to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flow. Internet has become the major area of global competition. This paper aims to revisit the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NWICO) movement, which took place from 1970s to 1990s, and predicts the possibility of similar movements in the new environment of Internet. It is found that the global order on Internet is unequal and imbalanced, with the U. S. as the most powerful force. In search of the new order, it is strongly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reconsider the subjectivity, rediscover the core values and rebuild the coordinative mechanism.

Key words: Interne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lobal power shift;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NWICO)

(责任编辑: 沈松华)